

Politics of Fear:  
Pension Insurance and Chinese Peasant Workers

Wei SHI  
Shih-Diing LIU

恐懼的政治性：  
養老保險與中國農民工

史唯、劉世鼎

本文為澳門大學研究項目 Ambiguous Identities (MYRG126-FSH11-SW) 的部分研究成果。我們感謝在田野工作中接受訪問的工人、NGO 組織的成員，以及協助訪問、收集資料並整理文稿的澳門大學博士生研究助理孔夢尋對本文的成稿所給與的幫助。我們也特別感謝《文化研究》編委會及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所提出的寶貴建議。

史唯，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weishi@umac.mo

劉世鼎，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sdliu@umac.mo

## 摘 要

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大陸社會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本文主要以深圳慶盛工廠的農民工因為養老保險的問題所導致的集體罷工事件為主要的分析案例，從情感的、政治性的角度來探討農民工作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之一，在遭遇脆弱的社會保障時所產生的恐懼，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行動。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包括恐懼的政治性如何在一種關係性的權力架構中循環和相互作用，即權力集團基於自身對於失去權力的恐懼如何發展出一套「自上而下」的治理策略，通過長期的政策性歧視，以及與資本的共謀，造成了農民工們因未來生活沒有保障而感到恐懼，而這些處於弱勢的、「自下而上」的恐懼，又是如何轉化成為具體的政治行動，反過來強化了權力集團的恐懼。沿著這樣的分析路徑，本文著重探討這些性質不同、方向各異的恐懼的政治性，如何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如何通過身體的控制以及主體性和身分認同的建構來展示政治對抗。對於處於多重壓迫下的農民工而言，恐懼的政治性作為一種培力實踐，反映出他們試圖擺脫既有權力關係的限制，重新定位自己，並努力以此生產出新的、更為公平公正的權力關係。

關鍵詞：農民工、養老保險、恐懼的政治性身體、主體性、身分認同

## Abstract

The social conflict triggered by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has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the ensuing crisis of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 episode of the strike action staged by a group of migrant workers at a UNIQLO supplier in Shenzhen, exploring the vulnerable group's fear generated by the underpay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political action that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politic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ays in which politics of fear configures and articulates in a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power; the hegemony formulates a set of top-down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out of the fear for losing power, which in turn create the fear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long-standing prejudicial policies and complicities with capit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inflicted fear into concrete political action 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fear of the hegemony. Through such analytic trajec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eterogeneous political formations of fear, how they are interwoven in complex ways, and in particular how the performance of opposition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bod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under multiple forms of repression, the politics of fear may create a space of self-empowerment, allowing them to reshape self-identities and subvert the existing power relations in their adversarial confrontation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 Pension insurance, Politics of fear, Body, Subjectivity

## 一、「以後該怎麼辦？」

「以後該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深圳慶盛製衣廠(Artigas)的女工伍忠芬格外憂心忡忡。已經年滿五十歲的忠芬，1984年從廣西玉林來深圳打工，1994年進了慶盛製衣廠。之後因為回老家結婚生小孩，曾經辭職離開一段時間。累計下來，忠芬在廠裡斷斷續續幹了將近二十年，可是廠裡給她買養老保險的時間累計不足兩年，這意味著等忠芬到了六十歲退休的時候，會因為繳納保險金的年限不夠國家規定的十五年，而無法享受到養老保險。她很希望工廠能夠從她入職時起給她補繳養老保險，然而在和工廠的交涉中，這樣的希望愈來愈渺茫。想到退休後的生存基本沒有保障，忠芬心生恐懼。

同樣是慶盛廠的女工，何妹子也對未來的不安定感充滿焦慮。來城市打工超過二十年，每天工作12小時，而且加班費還經常被剋扣。2010年工廠開始為她買社保，而之前漏繳的社保廠裡不願意補繳，因此，要想退休後領取養老金，五十歲的何妹子還要再工作十一年，這讓她感覺自己很像是用過即棄的廢物：「我們90年代初就來深圳打工，當時沒有養老保險制度；現在有了，廠裡又不給我們補繳。我的人生一輩子有多少個18年，最美好的18年都留在這裡。那時候年輕，現在我們老了，就像掃垃圾一樣掃走我們。」

恐懼和焦慮讓忠芬和何妹子不能坐以待斃。2014年12月和2015年6月間，她們都積極參加了兩次向工廠追討退休養老保險的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處境基本上都和她們兩人一樣，都是在慶盛廠工作了十幾年、甚至在建廠之初就開始在廠裡工作，而面臨退休時無法享受養老保險。作為港資利華成衣集團旗下公司，慶盛廠建立於1992年，主要為優衣庫(UNIQLO)和G2000代工。儘管慶盛廠在深圳算是相當有知名度的港資企業，但是在對待工人的相關待遇上卻長期存在著工時長、基本工資低、工作環境惡劣、以及處罰制度嚴苛等問題。隨著全球經濟的衰退，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中國政府對於人民幣的管制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利華集團開始縮減在中國的生產規模。從2011年起，其在中國的員工數量減少了三分之一，並於2013年將主要生產地轉移到薪水只有深圳工人一半的越南。2014年底，當慶盛工廠宣布與利華其他工廠合併甚至關廠的時候，很多工人直接面臨去留的問題，這時他們才驚覺自己雖然入職多年，工廠不但沒有依法從他們入職起繳足社保，還將從薪水扣除的社保金額轉移到部分管理層員工的社保金中，這讓工人們忿

忿不平，要求廠方盡快補足欠繳的養老保險。面對工人的訴求，資方一直規避責任，甚至要求工人自行出錢代公司繳交積欠的社保金，並勸退剛滿五十歲的工人。憤怒的工人於是聯合起來，分別在2014年12月和2015年的6月，先後兩次以罷工、占領工廠、到政府部門上訪等行動來爭取自己未來的保障。

事實上，類似慶盛工廠的漏繳或不繳納工人的社保養老金的行為，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甚至全國都非常普遍。<sup>1</sup>從全國的範圍來看，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問題也愈來愈成為中國社會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從目前中國各個群體所擁有的資源來看，最需要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的，就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的農民工總計達2.73億人，其中50歲以上的占到17%，即超過4,600萬人。如果把40到50歲這個年齡段也算上的話，那這個年齡段的比例是26%，總數將近1.2億人。由於現有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的體系非常脆弱，這也意味著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之間，將有過億的人口生活在老無所養的恐懼中（國家統計局 2015）。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從情感分析的角度，對農民工所面臨的恐懼以及由此所關聯到的當權者的恐懼進行分析。很多研究都有對中國農民工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但是從情感的面向來介入的分析仍然很少見。既有的研究主要從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角度去關注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包括低下的社會位階、被城市人歧視以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等等（Chang 2009；李強 2012；張玉林 2012），或者是從政治經濟結構的面向，探討農民工在社會轉型中所面臨的社會分層歸屬、其階級屬性與認同形構（潘毅 2007；潘毅等 2010；楊繼繩 2013；Goodman 2014），以及由此而可能產生的政治抵抗等等（Lee 2007；汪建華等 2015）。這些深入的研究儘管或多或少都關聯到情感的問題，但情感並沒有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議題而得到應有的重視。

---

1 2014年中國最大鞋業製造商、臺資的裕元鞋廠，就因為工廠沒有按照法律處理好工人的福利保險的問題而引發3萬工人參與、持續了長達12天之久的大罷工。這次事件喚起了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對於養老保險以及福利問題的關注。最終資方承諾補繳社保金並加發生活津貼，但沒有回應工人提出的加薪、改組工會及簽署集體合同等訴求。罷工在警方介入後宣告結束。

## 二、情感能做什麼？

長期以來，情感被看成是屬於個體的某種特質，往往和非理性扣連在一起，因此被排斥在可以被理性分析的視野之外。簡約化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論的認知模式所隱含的假設是，人們的一切想法和行為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由外在於個體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而忽視了結構性的因素之所以能夠產生作用，恰恰離不開特定歷史與文化的諸多因素，而情感正是諸多的文化面向中極為重要的元素之一 (Williams 1961; Thompson 1963; Grossberg 1988; 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Johnston and Klandermans 1995)。情感儘管是無形的，但是其呈現的方式卻是通過感官、語言、姿態、表述和身體等方式，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地扣連在一起的。因此，在既有的關於情感的論述中，情感如同意識形態、資本、道德等範疇一樣，也被一些學者看成是重要的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要素，在構建人們的主體性、認同、文化實踐、社會範式、意義生產和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中不可或缺(Buechler 2000; Goodwin et al. 2001; Ahmed 2004; Reed 2005; Hoggett 2009)。

在本文中，我們將在眾多的跨學科的情感研究取向中，採用文化研究的視角來展開對於情感的討論。這樣的取向，廣義上講，一方面不同於傳統的心理學的認知，即所謂的「由內而外」的模式，將情感看成是純粹個體的某種特定的內在屬有，當其表達出來的時候才變得具有社會性；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等同於社會建構論的主張，即所謂的「由外而內」的模式，情感被看成是外在於個體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相互作用的產物，並可以被歸結成各種不同的情緒規則(feeling rule)，再成為人們的某種屬有和特質(Hochschild 1983; Clarke et al. 2006)。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來，情感是介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方式和媒介。或者說，情感不是作為一種本質的存在而寄居在主體或者客體當中，而是在其間流動、循環的一種能量或者場域。如同Margot L. Lyon所表述的，情感「同時是個體的，也是群體的，是介於彼此之間的關係和動力」(1998: 46)。相較於追問情感屬於個體還是社會的、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問題，文化研究更關注的是情感如何在兩者之間流動、扣連並產生意義。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研究不是去追問什麼是情感，而是探討「情感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由此而所產生的影響(Ahmed, 2004: 4)。簡單地講，可以包括：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情感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語境下將個體、群體以及社會結構扣連在一起，並帶入到關係性的權力網絡中；情感如何在這樣的權

力關係中鞏固既有的社會霸權，或轉化、生產出新的權力關係與社會認同。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實踐，情感被看成是建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和社會認同的重要場域，而情感的政治性也恰恰存在於其能夠扣連社會關係，建構主體性以及循環(circulate)和生產權力關係與意義（Grossberg 1988; Ahmed 2004; 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2010）。

結合到中國的語境，情感所代表的文化的面向為當代中國社會形構的複雜性的分析提供一個難得的視角。以慶盛農民工所流露出的恐懼為例，恐懼的情緒如何在農民工和權力結構之間相互扣連、糾結並形構彼此之間的疆界，與此相關聯的是，恐懼又是如何呈現出農民工曖昧的身分認同與主體性等等，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深入地探討。

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將以慶盛工人罷工的例子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分析的素材包括第一手的田野調查資料。在第二次罷工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們曾對慶盛工人和當地的一些NGO組織進行實地採訪，由於罷工剛剛結束，當地政府和廠方對於參加罷工的工人的行蹤進行嚴密監視，廠區周圍和工人的住宿區遍布便衣警察和閉路監視器，很多工人怕惹麻煩都盡量迴避。即使是載我們的三輪摩托師傅，在聽到我們想見工人的意圖後，也很懷疑我們的身分，擔心因為幫我們而給自己惹上麻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只能和十幾個住在離工廠不遠的同一棟樓、仍然希望養老金問題能夠得到解決的工人進行交流，這些工人主要是女性，接近退休年齡，有的還因為參加罷工被警察拘留了一段時間。因為考慮到受訪者的隱私問題，文中的受訪者均以化名的形式呈現。另一部分的資料來源是微信和微博。兩次罷工期間工人們都在NGO組織的幫助下建立了微博和微信，主要的目的是向社會隨時傳遞罷工的信息和進展。儘管這些自創的資訊渠道很快被官方所封殺，但是仍然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可以作為文本分析的素材。除此之外，一些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網站也都對慶盛的罷工做了相關的報導，這些報導所涉及的一些人物故事，有助於更深入地了解罷工初期工人的心理狀態和梳理罷工發生的脈絡，因此，這些媒體文章也是重要的分析資料和來源。

我們主要的問題意識包括，恐懼的政治性如何在一種關係性的架構中循環和相互作用，即長期的政策性歧視與資本的肆意剝削，如何造就了農民工對於沒有保障的未來生活的恐懼，而這樣的恐懼又是如何轉化成為具體的政治行動，反過來造成了既有的權力集團（尤其是政府和國家機器）的恐懼。

這些性質不同、方向各異的恐懼的政治性，如何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並反映在國家矛盾弔詭的政治論述以及具體的法律和政策中，這樣的結果又是如何建構出農民工們的自我認同和主體性。在此，我們希望藉助文化研究對於情感的政治性的相關論述，特別是對於恐懼的政治性的討論，來分析農民工在養老保險的問題上所遭遇的恐懼。為了更有效地闡釋這些問題，有必要對於恐懼的政治性做一個概念性的釐清。

### 三、恐懼的政治性

恐懼被一些學者看成是當下社會的一個普遍性的話題，也是現代生活的主要的症候之一 (Massumi 1993; Furedi 1997; Bauman 2006; 寧應斌、何春蕤 2012)。從字面上看，恐懼的意思指的是人們在處於某種危險狀態中所產生的一種令人不愉快的情感，也是對於即將發生的危險感到力不從心、無法駕馭而產生的擔心和焦慮。因此，恐懼往往與擔心、焦慮等情緒聯繫在一起，儘管意義並不完全一致。按照既有的解釋，慶盛農民工所經歷的更接近一種恐懼的體驗，因為恐懼往往是由於某個特定的客體或情勢所引起即將發生的傷害或者失落的一種情感，而焦慮則是指一種常態式的對於諸多不愉快的情勢或危險的擔心，而不是只針對某個特定的對象和議題。不僅如此，恐懼往往指向未來即將發生的傷害，一種對於將要來臨的痛苦期待 (Fischer 1970; Rachman 1998; Ahmed 2004)。如同 Ahmed 所強調的，「恐懼存在於與特定客體的關係中，在於面對客體時的情感張力，會因為失去客體而變得更加強烈。……我們所恐懼的客體並不僅僅是簡單地出現在我們面前，而是會對當下的我們造成一種印象，即可以預見未來的痛苦」(2004: 65)。養老保險所引發的，正是農民工對於未來的生活沒有保障所可能出現的悲慘情境的預見。扣連到農民工長期以來卑微的社會地位和其所經歷的歧視，農民工們所遭遇到的恐懼意涵應該更為寬泛，對於即將到來的未來的恐懼，是與其過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社會苦難所形成的焦慮分不開的，是過去的焦慮和痛苦的延展，也隱含了他們對於這樣的處境的不安和不滿、甚至憤怒。因此，這裡的恐懼更適合做一種廣義的理解，兼容多種複雜的情緒和感受。

和其他情感一樣，恐懼的政治性也是和特定權力關係連接在一起的，與權力關係具有內在的關聯。恐懼在不同的個體、群體以及社會結構之間流動，

不同的群體因為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對於恐懼的認知、反應甚至界定也不一樣，其相應的針對恐懼的策略和路徑也不一樣。可以說，作為個體或者群體的主體，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對某些危險感到恐懼，並影響他們對於這些危險的反應和行動(Flam 1993; Robin 2004)。因此，恐懼的政治性並不僅僅歸屬某個或某些特定的群體。如同Corey Robin (2004: 20)所指出的：

不僅僅是權力集團通過製造恐懼行使權力而使得沒有權力的人感到恐懼，前者自身也會被常常被恐懼所困擾。這樣的恐懼或者是由於不公正地對待弱者而產生的內疚所導致，或者更為常見的，是恐懼沒有權力的人某一天會站出來反擊他們。

簡單地來看，本文中的恐懼的政治性至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觀察，一是「自上而下」的恐懼，掌握霸權的群體（通常是通過國家、政府以及資本的掌控者等體現出來），經常為了某種目的積極地建構恐懼，向公眾推銷如恐怖、驚慌等情緒，從而利用這些情緒來有效地掌控社會。這種將恐懼建構成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的治理手段，在當代社會非常普遍(Massumi 1993; Robin 2004; Altheide 2006; Barbalet and Demertzis 2013; Macus 2013; Shalhoub-Kevorkian 2015)。另一類的恐懼也許可以稱為是「自下而上」的恐懼，主要針對的是處於社會霸權宰控之下的群體，尤其是像農民工這樣的身處社會底層的群體。他們的恐懼來自於權力結構的壓迫，使他們無法獲得或分享相應的社會財富以及保障，不僅如此，還被建構成為具有威脅性和危險性的他者，從而制度性地被排斥在外。但是這些處於弱勢的群體並不完全是被動的，在預感到即將來臨的不確定和傷害之間，恐懼使得他們要有所作為，而採取相應的行動，如同慶盛的工人的請願、罷工、占領工廠等一系列的抗議行動。這樣的情形也說明，如同權力關係一樣，恐懼也是辯證的、關係性的，一方面被各種社會形構和權力關係所建構，同時也作為社會形構的要素而具有生產性，即挑戰和改寫既有的權力關係、重構新的權力結構。所以說，弱勢者的恐懼不僅僅是被動的、馴服的，也具有打開新的政治空間的創造性。這兩個面向並不是彼此孤立分離，而是相互交織在一起、互為因果的，處在一種持續不斷地拉鋸、爭鬥，有時也相互妥協的過程中。



## 四、「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恐懼

### （一）「自上而下」的恐懼及其弔詭

對於社會霸權而言，其根本的恐懼無外乎就是失去權力的掌控，因此，社會霸權總是會處心積慮地預防和阻止任何潛在的對於政權的威脅，以免造成霸權的危機，而其中最為常見、也最為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建構和想像出一個危險的、具有威脅性的他者的存在。恐懼的政治性的邏輯是，這個他者是「令人恐懼的」(fearsome)，會威脅到「我們」作為權力的掌控者的存在，使「我們」失去權力。為了避免這樣的可怕的事情發生，「我們」必須對於這些威脅「我們」的他者採取行動，從認知、論述、法律、政策和日常生活的區隔等各個方面對於他者進行管控和排斥，從而使得對這些他者施行的暴力合法化和正當化(Ahmed 2004; Robin 2004; Kinnvall 2013; Shalhoub-Kevorkian 2015)。

這樣的政治策略被廣泛地運用在中共的鬥爭歷史軸線中。毛澤東(1893-1976)所一貫堅持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 1991a: 3)一直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方針和基石，尤其體現在其獲得政權之後，用以鞏固政權的治理性當中。其所針對的「敵人」指的就是那些在權力爭鬥中被看成是對手 he 者。在毛時代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這些 he 者被統稱為「階級敵人」，但其所指涉的具體的人群卻因為每一次政治運動的性質不同而不同。在建國初時期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主要針對國民黨的殘餘勢力、資產階級以及舊時代的土匪黑社會等；1950年代中後期的「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則針對具有不同社會思想的知識分子；而文革則主要針對黨內的異己者，尤其是那些被看成想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僚。對於失去政權的恐懼，通過不斷地製造「階級敵人」來維持階級鬥爭長期存在、需要不斷革命的政治理念以及政權的正當性。

為了維持群眾對於這些政治運動的熱情，情感總是被有效地動員成爲一種重要的治理策略，而毛澤東被看成是將政治與激情聯繫在一起的大師 (Perry 2002)。如同毛所指出的「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毛澤東 1991b: 871)，愛和恨兩種相互對立的情感被廣義化爲具有特定的階級邊界，尤其是對於階級敵人的恨，更是展現爲種種儀式性的表演，比如憶苦思甜、批鬥會、自我檢討等等表現形式。以憶苦思甜這種形式爲例，群眾往往被發動起來控訴階級敵人的罪行，控訴的重心往往集中在這些作爲階級敵人

airiti

的個體的邪惡本性，因此這些他者往往被很情緒化地與許多負面和貶義的稱謂聯繫在一起，如牛鬼蛇神、惡魔、吸血鬼，使其成為人們所憎惡和仇恨的對象。也正因為這些他者被妖魔化為仇恨的對象，是邪惡的，所以對於他們的一切懲戒、規訓、無論是精神的還是身體的迫害、甚至處死，都具有了理所當然的道德正當性和合理性(Huang 1995; Liu 2010; Tong 2011)。通過這些多樣的、放大的、同時又很道德化的控訴儀式，如同劉瑜所觀察，「群眾被鼓動得對於『敵人』有一種近似饑渴的期待和需求。沒有『敵人』，就沒有仇恨，而沒有仇恨就沒有革命的動力。妄想狂被當成革命的一種必然，成為不斷革命的內在動力。」(Liu 2010: 342)。

農民這個群體，僅就其所占龐大的人口絕對量而言，往往是被政治動員起來面對「階級敵人」的絕對主體。中共恐懼的政治性的弔詭之處，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中共一直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理論上應該是將工人階級預設成革命的主體，而不是農民。然而，中共奪得政權所依賴的社會主體恰恰是農民，也是通過發動農民來進一步維持政權。因此，「階級」這個概念，就其本義來講，本應與農民的概念格格不入，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其所代表的「政治象徵和階級主體之間的恣意性是如此的明顯」（潘毅 2007：16-17），符號義和符號具之間的扣連顯得更加武斷。作為革命實際主體的農民，無法像工人階級那樣在政治論述中占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而只能被看成是無產階級的盟友。不僅如此，農民常常因為具有小農意識，而與落後、保守聯繫在一起，甚至在實際的政策實踐中，農民被當成是次等的、落後的他者。很多研究都對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所實行的戶口制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辜勝阻 1991；Cheng and Selden 1994；Solinger 1995；Fan 2002）。這樣的戶籍制度乃根據居民所在地將其分成兩類，即「農村戶口」和「非農村戶口」。擁有「非農村戶口」的居民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好的就業條件和機會、更完善的社會福利，尤其在毛時代，城鎮居民還享有有保障的食物配額和住房供應，而且這樣的優勢和優惠是可以世襲的。相比之下，對於擁有「農村戶口」的人來說，他們卻沒有辦法享受到相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其生活的標準和機會也遠低於城鎮的居民。直到今天，農民仍然無法享受和城市人一樣在教育、就業、醫療以及養老等諸多方面同樣的社會保障，只要他們的農民身分沒有改變，他們的命運就不會改變，而是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戶口制度不僅僅區隔了人口的居住地，更決定了一個人的生存權力和機遇。在與城市人的二

元關係中，農民被看成是低級的群體，一個次等的他者。這樣的戶籍制度與其他地方（如前蘇聯與南非等地）的族群隔離政策有異曲同工之處 (Jacka et al. 2013)。在此，農民如同其他的弱勢群體一樣，其被建構出來的低劣、不文明、次等身分，成為凸顯城市人口優越且重要的必要條件，農民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被制度化為處於劣勢的他者 (Solinger 1995; Lee 2007)。

為什麼作為革命的主體不但沒有因為革命的成功而成為優勢階層，反而被制度化為次等的他者，這樣的弔詭，折射出了中共在治理性上一種隱秘、潛在的恐懼，那就是對於農民的恐懼。這種恐懼主要表現在，執政的共產黨深知農民身上所潛藏的巨大顛覆力量，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歷史就是通過依靠發動農民運動來奪取政權的。這樣的顛覆性的力量，使農民被看成是一個潛在的危險力量，有可能影響到政權的穩定性。同時，龐大的農村人口對於基本的社會福利與權利的巨大需求，被看作是會對城市人口的生存造成威脅，他們的存在會瓜分和損害城市人的利益。如何能夠「安撫」、「馴服」這個具有潛在威脅性的他者，同時又能夠使他們處在相對弱勢、被剝奪的地位，成了中共恐懼的政治性的重要考量，也決定了其在具體的政治策略上的矛盾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將農民與階級敵人區隔開來，並賦予其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相較於階級敵人而言，農民被看成是改造和清除異己思潮以及資產階級思想的意識形態的重要資源，成千上萬的城市人口，無論是「反右」和「四清」運動中思想落後、反動的城市幹部，還是「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年輕人，都被送到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然而這種政治上的華麗辭藻背後所伴隨的政治經濟的考量，卻是因為不斷的政治運動而導致的經濟停滯使得城市無法負擔城市人所享有的基本生活配額，而需要將這樣的負擔轉嫁到農村和農民身上。在計畫經濟體制下，農業扮演的是國民經濟基礎的角色，發展重工業的資金主要靠農業積累，發展輕工業的原料靠農村提供，城市的糧食靠農村生產，可以說農村和農民承擔著上述各項國家工業化的成本和負擔，承擔了整個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物質保障。然而，在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分布中，農村和農業的價值被貶損，農民的權力被嚴重地忽視 (Pai 2012; 楊繼繩 2013)。

這種弔詭曖昧的態度也體現在各種形式的論述中。比如，在主流傳媒的再現中，農民一方面被空洞化為「國家的主人」，享有名義上的主人地位，但同時農民又被高度汙名化為低劣、落後、愚昧的群體，農民處在失語的狀態，無法為自己發聲 (劉小平 2008; Sun 2009; 許向東 2009)。很多時

候國家的法律已經做了明文規定，聲稱要保護農民的權益，而地方政府爲了保護地方利益往往會制定一些相應的地方法規，這些法規並不完全與法律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以慶盛工人遭遇到的情形爲例，國家法律規定要保護工人的利益，因此資方和工人雙方都要繳夠十五年養老保險，這樣工人在退休後就能享受保險金，如果資方違約沒有繳納，有義務進行補繳，並需要支付額外的罰款金。但是這些國家法律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卻受到了深圳地方法法規的制約。深圳地方政府爲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而同時規定，即使資方需要幫助工人補繳養老金，最多只能補繳兩年，慶盛工廠就是以此作爲駁回工人訴求的主要依據。這些相關法規論述自相矛盾的結果是由工人爲此付出代價，很多在慶盛廠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最多只能夠得到兩年養老保險的補償，而廠方漏繳的部分則因爲地方法法規的保護而被合理化。正是在這樣矛盾的政策中，農民工所謂的權益，只是鏡中月、水中花，有其名無其實。

隨著毛時代的結束，以國家主導的強調市場開放、鼓勵競爭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徑，取代了既往的「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政治運動（Harvey 2005；汪暉 2008），以往建構出來的「階級敵人」概念失去了意義。而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擴大，由於權力結構本身的不公平、不均衡所產生的社會利益的巨大分野，社會對抗力量往往來自於那些在權力結構中被排斥、被擠壓、基本的生活權和生存權受到威脅的群體，如農民工、下崗工人、被強制拆遷的底層市民等等。這些人的不滿、抗議和權益爭取，構成了權力集團最爲擔心的社會隱憂。隨著此起彼伏的抗爭運動的出現，中央政府比以往都更加關注社會的穩定。從2003年起，「維穩」（維持社會穩定）被看成是最具有優先性的政策之一，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這些群體抗爭事件的出現破壞了政府的形象，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因此被看成是對政府合法性的挑戰和威脅。「維穩」也因此成爲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級地方政府有義務保證社會安定，避免出現任何可能的動亂。在這樣的氛圍下，各種形式的勞資矛盾和衝突所引發的群體抗爭，也愈來愈成爲各級政府維穩的重要內容。如同Sarah Biddulph所分析的：「（在中國，）黨國所面臨的一個困境是，與日俱增的勞工爭議，尤其是大規模的群體抗爭，不僅彰顯出中國工業結構的系統性問題，以及工人維權意識的提升，也增加了他們對於社會動盪和政權不穩定性的恐懼」（2015: 27-28）。

## （二）「自下而上」的恐懼及其行動

情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處在相互拉鋸、協調和鬥爭中的，並且會生產出新的情感，這樣的過程永無止息(Grossberg 1988; Ahmed 2004)。「自上而下」的恐懼往往是和「自下而上」的恐懼相伴而生、互為因果。從這樣的脈絡來看，農民工對於養老保險的恐懼並不是偶然的，也不僅僅是因為工廠規避責任而造成，而是與農民長期所處的卑微與弱勢的社會位階分不開的。

農民們往往把離開農村，看成是擺脫「賤民」身分與生存狀態的出路。198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經濟改革開放為他們提供了脫離農村的機遇，大量的農民工湧向城市，成為「世界工廠」的主要勞動力。儘管作為打工仔，農民的收入和以前相比增加了，但是從資本的結構來看，他們仍然處在被剝削的最底層。超長的勞動時間、超重的勞動負荷、超低的薪水回報以及極度不健全的勞動保障系統，幾乎構成了中國農民工作為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動力最普遍的特徵（Solinger 1999；Zhang 2001；潘毅 2007）。儘管如此，這樣的努力仍然沒有使得他們擺脫「賤民」的身分，戶口制度使得他們即使在城市裡工作，仍然與城市的住房、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無緣，農民所處的劣勢位置，使他們無法改變在城市裡被排斥的命運（張玉林 2012；李強 2012；Jacka et al. 2013）。

以慶盛廠為例，工廠為了迴避工人的福利問題，與工人們簽不同的合同，即使同一工作地點的人，都可能有四種不同的合同，不同的合同限定了工人不同的權限和待遇，使工人們應得的待遇被擱置。另外，這些農民工每天在廠裡的工作時間接近12小時，碰到趕貨時期，一個月才能休息一到兩天。按照規定，工廠的工資是計件的，工人的加班工資應該是正常工作時間的一倍半，但是慶盛廠仍然按照平時的工資計算。不僅如此，製衣廠的環境惡劣，工人們每天都在充滿著棉絮灰塵的空間中工作，沒有任何健康保健和防護措施。尤其是在盛夏，車間裡通風不暢，悶熱難忍，工廠擅自扣留高溫補助費，農民工的體力常常備受考驗。即使生了病，工人們也擔心薪水會受影響而不敢請假。如果是很嚴重的病，工人們即刻會被工廠辭退回到農村，工廠並不需要為此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

45歲的謝姐來自湖北，在慶盛廠工作了十年，但是廠裡只為她買了兩年的社保，長期的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我原先長期積累的養老保險呀、住房公積金都沒給，我能相信退休後會給我嗎？這樣就產生了不信任感嘛，

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才有保障呀。」作為「賤民」，農民工是無法得到體制上的保護的，農民在這樣壓迫性的結構中所遭遇的拒絕、排斥和剝削，也使他們作為公民所應該擁有的安全感消失殆盡。正如同工人小林所感嘆的：

我一直在想，我們的命運全部由這個社會在擺動。90年代我們就開始進城打工是不是，打工到老又來了這個政策，所以我們傷心。明明我可以在這裡拿到養老金，但是我領不到。整個我這個人生，就被這個社會搞來搞去，做了個犧牲品。<sup>2</sup>

如前所述，並不是所有的擔心都會演變成恐懼。但是對於像農民工這樣處於權力結構底層的群體而言，沒有保障的未來很容易讓他們感到恐懼。在此，恐懼扣連到過去記憶和經歷的聯想，夾雜著過去的傷害和創痛，經由當下延伸到未來。在不斷與工廠的交涉沒有結果的情況下，農民工們實際上已經預料到未來將面臨難以逃脫的厄運。

作為一種關係性的文化實踐，在和強大的「自上而下」的恐懼互動、協商以及較量的過程中，農民工所建構的「自下而上」的恐懼儘管一直處於弱勢，無法與前者勢均力敵，但並不意味其永遠是被動的、處於劣勢的。相反，他們總是要做出某種回應和行動，無論是接受、沉默還是反抗。當這種「自下而上」的恐懼在面臨無法擺脫的絕望時，反抗便成為一個可能的選項。對於慶盛的農民工而言，恐懼的累積所觸發的是盡己所能地將恐懼轉換成能夠產生現實回報的行動。2014年12月15日慶盛工人在第一次罷工時，有工人在「慶盛工友維權」的微博上留言：

員工們日夜盼望日夜失望。政府在幹什麼？難道是同資方同一個鼻孔出氣的？廣大勞工你們別指望政府能夠為你們做什麼了。靠自己吧，我們的維權決心堅持到最後！這不僅是為我們，也為了廣大勞務人員的基本利益。

這個信息透露出的是工人們意識到資方和政府並沒有採取措施緩解他們的恐懼後，決定自己採取行動。這樣的行動儘管旨在獲得更為公平的對待，但其所產生的潛在影響卻可能是既有權力結構和關係的調整與改變。因為對於這些處在既有權力邊緣的人來講，當他們無法忍受來自於權力集團的宰控和壓迫時，挑戰和反抗權力集團便可能成為釋放他們恐懼的重要方式之一，政治性也由此而產生(Robin 2004; Kinnvall 2013; King 2006; Barbalet and Demertzis 2013)。如同Jack Barbalet所指出的那樣，恐懼對於社會運動而言並

---

2 取自2015年7月26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不是完全負面的：「恐懼使人們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到底是什麼，並指向怎樣才能獲得這些利益」（1998: 149）。從這個意義上看，恐懼的政治性不只是權力關係的產物，同時可能生產行動來影響權力結構，尤其是在遭遇危機而感到絕望的情況下(Ahmed 2004; Troost et al. 2013)。慶盛工人的兩次罷工、占領廠房以及到各級行政機關上訪、靜坐，都可以看成是他們試圖擺脫恐懼、奮力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即「維權」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恐懼正像是其行動的動力所在，恐懼產生行動，而行動可能會帶來新的改變。

## 五、維權與維穩：身體作為恐懼的政治性爭奪之場域

不同的恐懼的政治性往往是交織、扣連在一起並互為因果。如果說當權者對於農民的顛覆性力量的恐懼導致了對農民的制度性歧視，引發了農民的不安全感和對於未來的恐懼，那麼當農民們採取相應的行動試圖擺脫和紓解所面臨的恐懼時，這樣的行動反過來更加強化了當權者的恐懼。

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情感往往是附著在身體上，通過身體呈現出來，並在不同的身體間流動、滲透、重組。恐懼也是如此。恐懼的政治性，尤其是「自上而下」的權力集團的恐懼，往往是與他者身體的區隔、限定和宰控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即規範那些令人恐怖的他者的身體出現的社會空間，並實行嚴密的管控，以確保統治的安全性 (Ahmed 2004; Razack 2009, 2012; Shalhoub-Kevorkian 2015)。如前所述，戶口制度就是將農民的身體配置在農村，與都市無緣。所以當他們的身體出現在城市空間的時候，往往被看成是「流動人口」或者「盲流」等，無論他們居住多久都不能轉成城市戶口。作為次等的他者，農民的身體被合法地隔除在城市的空間外(Zhang 2001)。不僅如此，作為世界工廠裡的廉價勞動力，農民工的身體也同時被禁錮在工廠裡，承受著工廠嚴格的規訓、監控與剝削。如同很多研究所指出的，農民工的身體被長時間地捆綁在生產線上，如同機器一樣，只是用來滿足生產的需求、完成生產任務，並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的物件。而一旦工人病了、老了，幹不動了，或者工廠本身為了追逐利潤進行遷廠或者減產，他們的身體也像是「用過即棄」的物品一樣，重新被丟回到農村 (Jacka 1997; 潘毅 2007; Chang 2009; Lin 2013; 劉世鼎、史唯 2016)。對於可能面臨同樣命運的慶盛農民工來說，拒絕身體被給定的意義，並將身體當成抗爭的工具

是其維權的重要內容。

### (一) 「不怕酷暑日夜守在所有生產車間，只為討回血汗錢！！！」

這是工人們在罷工期間寫在自製的橫幅上的一段話。這樣的表達傳遞出一個訊息：在農民工看來，討回血汗錢，即爭取到自己的利益，與身體對於工廠生產車間的控制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繫。在這裡，身體、空間與恐懼的政治性之間的關係被凸顯出來。

沿著既有的權力關係，農民工很難改變自己的身體被用過即棄的命運。如果說對於權力集團而言，恐懼的政治性是要製造一種身體的界限，通過對於身體與空間的配置來展示其權力的控制；那麼，對於慶盛的農民工來說，恐懼的政治性則表現在他們希望打破既有的權力關係所設定的身體疆界，並試圖重新劃定新的身體疆界。從他們兩次罷工占領工廠的過程來看，農民工們在工廠內的靜坐、占領等行動，宣誓了他們對於既有身體界限的顛覆，擾亂了既有的權力關係所賦予他們身體的意義。如同罷工工人2015年6月18日在微博上描述的：「工友們堅守崗位不下班不吃不喝，集體堵在工廠門口，不讓廠方趁晚上把東西搬走。」農民工的行動使得工廠車間的意義發生了變化，由本來是農民工用來出賣自己勞動力並被規訓和監控的空間，變成了與工廠討價還價、爭取自己權益的空間。以何妹子和忠芬為例，在2015年夏天的四十多天的守廠過程中，她們兩個被分配在一起交替「換崗看設備」。何妹子每天從早上堅守到下午兩點，然後回家照顧孫子孫女，簡單地吃了午餐又馬上回到工廠，其餘的時間由忠芬負責。她們的本來的角色是為工廠生產產品的勞動力，然而在罷工的過程中，她們的身體拒絕再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代之以對抗者的身分，直到工廠能夠滿足她們的訴求。在此，占領車間和工廠的意義在於她們的身體不再是被動的、受約束的、按照資本的生產需求和規律而行動的機器，而被轉化成積極的、要求權利的、抗爭的政治身體。

不僅如此，工人們的身體抗爭不僅僅指向資方，也指向各級政府。他們後來走出工廠到政府各級相關部門上訪、靜坐，其身體展示的空間也由工廠延伸到政府和國家機構所在地的城市公共空間，通過自己的身體在城市空間的在場，而對權力機構形成有形的、看得見的挑戰。在第一次罷工中，慶盛的工人代表上訪了廣東省總工會，在第二次罷工中，工人們先後到工廠所在地的觀瀾街道辦事處、深圳市政府、市信訪辦公室、廣東省信訪廳等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前靜坐陳情。



他們（指政府）沒有為我們說過半句話。他們口口聲聲說，主持公道。但是並沒有，……勞檢說，你們這樣搞，工廠肯定要倒閉啦。他們就總是在考慮工廠那邊。我的人生一輩子有多少個十八年，最美好的十八年都在你這個深圳的話，我肯定要在深圳養老，當著政府部門的面說。

劉芳的表述表明這些上訪的農民工和政府各部門之間對立的緊張關係。農民工們自己宣稱「肯定」要在城市裡「養老」，與政府對於他們對城市的貢獻漠然處之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工人們看來，養老保險實際上代表的是他們未來在城市的合法性，使他們可以像城市人一樣留在城市，不再默認身體被用後即遭丟棄的命運。他們宣稱要把身體留在城市，表明了他們並沒有按照既有的權力遊戲在城市中隱身，而是宣誓並爭取其身體在城市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看，工人的身體輾轉在不同的城市間穿梭停留，直接挑戰了城市的空間被定位為屬於城市人所有，而與農民的身體和權利無關的區隔，並試圖重新定義自己的身體與城市的疆界。

## （二）「我們只是維權，沒有違法，為什麼要警察要抓我們？」

「為什麼警察要抓我們？」這是很多工人在罷工期間和之後都感到惶惑不解的問題。在兩次抗爭期間，不論是要求和廠方談判、還是占領工廠及上訪等行動，其最後的結果都是以被警察驅趕或者抓走而結束。在第一次罷工期間，在維權律師的協調下，工人們促成廠方承諾與維權工人進行談判，然而廠方卻帶領大批警察、保安，要求工人們無條件地即刻復工，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2014年12月17日早晨，工人們憤怒地在微博上大聲疾呼：「（老闆）真把我們一千位員工當傻子嗎？誰會相信先開工再解決問題？廠裡已經出通知說要與勞維律師會面協商，怎麼能出爾反爾，動用警察來鎮壓工人呢？這是解決問題的態度嗎？」由於工人不服，警察強行進廠毆打工人，數十名工人代表被帶走，其餘的工人被趕回車間。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第二次的罷工中，一百多位工人到深圳市政府上訪，結果被警察強行押送上車送回工廠。而在之後於廣東省信訪辦前的靜坐期間，沒有任何官員願意出來解決問題。工人們在酷暑中被蚊蟲叮咬了一週之後，最終迎來的是被警察押送到遣返回深圳的警車上，並且被逐個要求做筆錄、簽名，才能獲得釋放。可以說，在整個罷工期間中，警察時刻伴隨著工人，或是逮捕、審訊，或是鎮壓、遣返、監視，即使在罷工結束後，工廠裡仍然布滿便衣警察，隨時監控工人們的一舉一動。

作為維持政權的國家機器，警察的介入既代表了政府的權力，也代表了他們對於政權的不確定性與安全性的恐懼。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工人的罷工與上訪所引發的政府的恐懼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勞資矛盾的範圍，而是關於政權穩定性的問題。農民工的占領和靜坐行動，在政府的眼中並不會與工人應該獲得的利益聯繫在一起，反倒被看成是對於政權的挑釁和威脅。在此，農民工的身分和角色也發生了變化，不僅僅是一個次等的他者，更是一個對於政權有威脅性的、令人恐懼的他者。一般來說，這樣對於危險他者的想象，使得對於他者的暴力合法化，因為他者的存在被看成是自我存在的威脅，因此應該是管制和鎮壓的對象(Ahmed 2004)。

警察所代表的保障社會穩定的形象，間接地襯托出希望通過罷工、上訪維權的農民工，為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安寧的麻煩製造者，一個潛在的敵人。在「維穩」的語境下，保衛政權的穩定是當務之急，而不是農民工的權益。法律所假設的農民工應該具有的權利被遮蔽，農民工變成了令人恐怖的、並且只會製造和激化社會矛盾的他者。因此，在政府看來，當工人上訪的身體出現在城市空間的時候，上訪的原因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上訪所造成的對於社會秩序的破壞。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是廠方還是政府對工人的訴求並不真正感興趣，而更關心的是誰在組織工人罷工、誰是潛在的工人領袖。政府與農民工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使得孤立、懲罰和鎮壓等種種手段成為可能，暴力被合理化。

對於權力集團而言，通過「維穩」而體現出來的恐懼的政治性是明確而清晰的，那就是在保證國家安全與政權問題的命題下，對於農民工抗爭的壓制和鎮壓是必要的。如果說恐懼的政治性在農民工這方主要通過讓身體被看到的策略來行動的話，那麼政府的恐懼，則是盡己所能地使他們抗爭的身體和聲音變得隱形。工人們在罷工期間自製的標語和橫幅還沒掛出來就被廠裡的保安剪斷丟棄。工人們在微博上註冊的帳號也被封殺，甚至一些聲援工人維權的博客也被禁言。不僅如此，政府盡一切可能將農民工從上訪的地點押送回工廠，將他們的身體從城市的公共空間中抹去，從而使城市恢復到常態。在此，社會的穩定扣連到農民工的身體，需要通過使這些身體在公共空間中被抹去來實現。

同理，作為一個令人恐怖和具有威脅性的他者，農民工的身體必須要受到懲罰並置於持續不斷的監視和控制下。罷工期間被警察抓走的W，提起

當時被關押的日子仍然心有餘悸：「我被抓進去是要讓我承認自己是聽信謠言，『破壞工廠秩序』，如果不承認就要繼續關押……我可不想再進去了，一頓飯就一個饅頭，五毛錢的。地上就這種水泥地，你要坐著，要站著，要躺著，都只能那樣子……」<sup>3</sup>

即使後來被放出來，w 仍然感到自己的一舉一動仍被便衣警察監視著。

那段時間很恐怖。到處都裝了密密麻麻的監控器，樹上路上、廠裡廠外，車間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我親眼看到路過工廠的人一拍照，派出所馬上去抓，把人家的包包也搜查一遍，人也帶到派出所。警察會問說拍照有意思嗎？又沒有人在關注你們，於是把手機也沒收，真的是很恐怖！……到處都是便衣，在我們住房那邊，到處抓人，我們都兩三天不敢出去，廠方知道我們地址，帶警察過來，以查房的名義來抓人，有時還是在半夜三更的時候。人人心裡都感覺到很恐懼。<sup>4</sup>

農民工爲了消除恐懼而維權，希望通過身體的抗爭打開新的可能性，但是在「維穩」的語境下，不僅這樣的努力被遏止，而且對於農民工身體的監控更是滲透到了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吃飯、上街、睡覺當中，農民工的恐懼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更加惡化。

## 六、「人民」vs.「公民」：農民工主體性與身分認同的重構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來，情感與認同是相互作用的。情感作爲一種社會形構的要素，在個體、集體、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中流動、扣連並產生出特定語境中新的社會形構，這包括認同與主體性的建構。主體所展示出的情感以及如何定位他者的情感，都與他們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密切相關，如同Harding所觀察到的，「情感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持續不斷地生產主體和權力關係的過程」(2009: 268)。情感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即是情感的主體性與社會認同是如何相互形構，而情感的文化政治性正是存在於主體性、認同、意義生產與權力關係的交互作用當中(Ahmed 2004; Harding 2009; Demertzis 2013)。

「自上而下」的恐懼及其弔詭建構出了農民模稜兩可又矛盾的身分認

---

3 取自2015年7月24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4 同上。

同。如前所述，農民一方面是空洞的「國家的主人」，一方面又是真實而具體的次等他者，被隔絕在城市與國家的保障之外。而隨著中國式新自由主義的深化，農民成為世界工廠的主要勞動力，其身分認同的複雜性和模糊性更加明顯。他們在身分上是農民，但卻離開土地，脫離了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模式，其實際身分已經由農民轉換成為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生。然而戶籍制度的存在又使得他們在都市勞動力的身分是暫時的，當他們的勞動力不再被需要時，他們的身分馬上又還原為農民。既是農民又是工人的身分，模糊了兩種不同的身分認同之間的界限，如同潘毅所觀察的，

戶籍制度與勞動力控制機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特殊的權力形態，建構出農民工模糊的身分認同，從而既深化又同時掩蓋了對她（他）們的剝削。……農民地位的模糊性，有助於中國政府在沒有充分認可其勞動者身分的情況下，仍可對其隨意使用。(2007: 71)

在這種模糊的身分認同中，農民和農民工經受著「多重剝削」的狀態，即是一個人或群體在其生命週期中，受到的前後相繼的、多次累加的被剝削現象（李強 2012）。對於權力集團而言，模糊化的身分更有利於對於這個群體的任取任用，又可以規避掉對於這個群體作為公民所應該享有的基本利益保障。

長期置身於這樣的權力結構當中，農民工對於未來的恐懼也自然而然地扣連到既有的權力集團所建構出的模糊的身分認同，以及其對於這樣的模糊、不確定的身分的不滿、失望、質疑和憤慨。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恐懼並不是單一存在的，而是和其他類似的情感息息相通的。這些情感代表了農民工在權力結構中對權力集團所設定的主體位置的反應，也表現出他們試圖擺脫這樣的主體位置，並代之以重新定位和改寫自己的主體位置的願望和努力。可以說，正是恐懼所串聯的一系列的情感反應，折射出了農民工自我定位與自主性的確立。

### （一）「我不相信『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我對政府失望透頂。」

歐小妹的這段採訪的原話是：

我不相信『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我對政府失望透頂了，沒有我們農民工哪裡有深圳的繁華，當初鄧小平來深圳，要發展，現在經

airiti

濟發展了，政府又不管我們。<sup>5</sup>

從情感與認同的相互關係來看，這裡的失望折射出了農民工的身分認同的內在矛盾性。從直接的字面意思來看，歐小妹對於農民工的自我定位是「人民」。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語境中，「人民」被官方話語建構成國家的主人，這個概念往往是相對於阻撓和破壞革命的「反動派」、「階級敵人」而言，因此當以「人民」來自居的時候，往往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為人民服務」正是毛時代所提出的對於國家公務人員的基本要求和義務，服務於人民的利益和滿足人民的需要被看成是政府的首要職責。這樣的主體位置所隱含的邏輯是，政府和人民是一體的，而不是分離和對立的，政府有義務和責任以「人民」的福祉作為重中之重。然而相對於國家所建構出的空洞的「人民」概念，農民工所認定的人民是切切實實為國家、為城市做出了貢獻的人民。「沒有我們農民工哪裡有深圳的繁華」一語道出了農民工這個群體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作為國家的主人做出的巨大貢獻，他們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因此，簡單地講，這樣的「人民」身分，至少在兩層意義上不同於霸權所建立的模糊的身分：一是農民工是「人民」，應該是國家的主人，而不是次等的、低劣的他者；二是農民工是有切實貢獻的「人民」，而不是維穩的論述中所指涉的具有威脅政權安危的、令人恐怖的他者和麻煩製造者。

這種對於「人民」身分的認知差異，反應了農民工在自我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建構上的策略。作為中國社會中最為弱勢的群體之一，農民工所占據的有限的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使他們很難像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政府、或占據經濟資本的資方一樣，可以運用掌握的權力來建構相應的宰制性論述。處在權力的邊緣，工人們更多的是在既有的權力論述中找到對自己有利的論述，從中找到能夠支持自己的依據，而不是建構新的論述 (Lee 2007b; Hsing and Lee 2010)。「人民」的身分正是農民工們利用其霸權論述中的正當性來為自己培力，其政治性表現在巧妙地利用霸權本身的論述來與霸權周旋。

事實上，農民工們對於政府的失望，即沒有看到各級政府能夠積極地出面解決問題，一直或多或少地貫穿在工人們的抗爭過程中，只是隨著抗爭的持續，這樣的失望越發強烈。工友阿黃對於這樣的經歷深有感觸：

我們就說有什麼事首先要找的是工會，找的是勞動主管部門，找的

---

5 取自2015年7月24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是國家相關部門。所以說，剛開始的時候也都會找工會，找勞監，找信訪啊……但是往往是他們的作為回過頭來讓工友們失望。其實去年這個問題也找過省總（廣東省總工會）那，這問題一到省總那基本上已經算是很高層了，但是省總從一月份到六月份這五個月沒有任何作為，完全讓工友們感到失望。

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幾千年的封建禮教思想來說，想找包青天，但是沒有找到，所以心裡落差還是比較大的……<sup>6</sup>

農民工所感受到的「失望」、「失望透頂」，在很大程度上彰顯出國家和政府所建構的「人民」論述的空洞和自相矛盾。當農民工們套用霸權的論述來認定自己作為「人民」的主體位置、並賦予活生生的體驗和意義時，這樣的身分認同所反映出的卻是政府在對待「人民」時的失職和失敗。在農民工看來，作為國家的主人，當其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如廠方拒絕支付工人的養老保險，應該理所當然地獲得政府的保護和支持，而不是淪為受害者。在具體的抗爭過程中，「失望」與「人民」的主體身分扣連在一起，指涉的是在現實權力關係的對抗中，政府不但沒有保護他們，反而和剝削他們的廠方形成了緊密的共謀關係，而他們只能是這種共謀關係的受害者而已。如同在罷工清場過程中，曾經被警察打傷的段姐所感慨的：

我們去找政府理論，可他們告訴我們說，你們幫老闆打工，就要聽老闆的安排呀，叫你去哪裡做你就乖乖地去哪裡做吧……我們終身都可能難忘這件事情，我跟人說身體的傷好快癒合，心裡的傷啊永遠……可能這輩子都會記到。這就是打工的悲哀……實際上，我們爭的不僅僅是錢，真的，不完全為了這個錢，而是為了我們工人的尊嚴，要爭這口氣……<sup>7</sup>

農民工們真實的處境，映照出霸權論述中「人民」以及「為人民服務」的空洞、虛妄和矛盾。「人民」更像是一個空符徵，與「國家主人」的所指是斷裂而矛盾的，而在抗爭過程中填補了「受剝削和壓迫的弱者」。從這個意義上看，恐懼和失望所催生的是農民工對於既有的主體性的挑戰，並轉化了權力集團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模糊身分認同。可能對於農民工而言，挑戰並不是他們的初衷，其初衷可能僅僅是獲得國家的保護和得到相應的權益，但是這樣的初衷在與失望、不滿等情緒接合在一起的時候，導致對於生命狀態更深的恐懼，挑戰的意味便是在試圖竭力擺脫恐懼的過程中被生產出來，至少他們的情感實踐改寫了霸權論述中「人民」的內涵。這也表明不

---

6 取自2015年7月26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7 取自2015年7月24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airiti

滿、失望和恐懼並不只是被動的情感實踐，在其相互接合的過程中，也同時在無形中召喚著另一個主體身分的成形和出現。段姐所強調的「爲了我們工人的尊嚴，要爭口氣」，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這樣的主體應該是有尊嚴的，應該擁有某種權力能夠爲自己「爭口氣」的。在農民工們非常有限的可用資源當中，國家的法律論述所賦予的公民身分便成爲一種非常重要的策略選擇。相較於「人民」身分的空洞和虛妄，「公民」身分提供了另一種抗爭的命名選擇。在實際的運作中，「公民」不僅具有法律所認可的尊嚴和權益，更能將主體的權利扣連到具體的法律條例當中，因此，這樣的身分建構更像是一種培力實踐。

## （二）「你說依法嗎？有依法依規嗎？我們一定要問他們。」

在「依法依規」的語境中，「我們一定要問他們」帶出了農民工自己所建構出的主體位置，即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而是同時超越二者的區隔、具有法律意義的「公民」。在中國官方話語中，作爲公民就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享有法律所承諾的公民應該有的權益。相較於國有企業的工人依靠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契約，享有國家提供的保障和福利，農民工們更多是以市場的勞動力的身分、依靠《勞工法》和合約來維繫與資本家和廠方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或多或少地導致了法律和權利意識的萌芽。如同李靜君所觀察的：「法律的普及、以及與此相連的公民身分的論述和合法權利，使得工人將自己視爲公民，並且意識到法律論述與自身所經歷的權利缺乏之間的矛盾。這樣的勞動力主體的建構與重構，是任何勞工抗爭都必需的因素」（Lee 2010: 55）。這樣的主體位置一方面使得農民工的抗爭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中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同時也意味著農民工與權力集團之間不是完全的宰制與服從的從屬關係，作爲「我們」的農民工，在法律上也擁有相對的自主性。

工人們對於其公民身分的定位，主要是根據現有的國家法律和相應的法規，把法律中所涉及的能夠保護自己作爲公民的權力的條文作爲抗爭的理據，以此來爲自己爭取權益。比如在2015年6月的第二次罷工中，工人們找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條以及《深圳經濟特區和諧勞動關係促進條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即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時，應當經全體職工討論，與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不得拒絕集體協商。工人們認爲，資方變更員工勞動關係（改變合同）和勞動條件（工作地點）都屬於重大事項，特別是對於沒有再就業空間的第一代農民工，他們在沒有養老保險的情況下，利益會受到嚴重損害，因此廠

方應該擔負起賠償的責任。

「你說依法嗎？有依法依規嗎？」這樣的疑問所呈現出來的是對於既有的權力集團有法不依的質疑，表達出了工人們的不滿和氣憤。以何妹子為例，她對《勞動法》和《深圳特區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耳熟能詳。她認為追討養老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第五十一條，其中規定超過法定強制追繳時效的，可以申請補繳養老保險費，並自應繳之日起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這也意味著工廠應該為她補繳養老金，而不是像工廠所說的那樣，她需要再工作十一年才能有養老金。在農民工看來，工廠和政府之所以能夠不「依法依規」，正是權力集團本身對法律的干擾所造成的。慶盛工人的例子正是地方政府的法規對國家法律的干擾，而使得可以保護工人權益的法律法規形同虛設。工人們氣憤的是這些法律法規都寫得清清楚楚，但無論是廠方和政府都不依法執行，反倒使用模糊的策略使其失去效力。

儘管靠法律和勞動合約來維繫勞動者的主體位置導致其公民權利意識的萌芽，但是其公民意識的增強則是在鬥爭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的。農民工在希望通過法律來維權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不滿和氣憤，促使他們採取進一步的公民行動，其作為公民的主體性也因此進一步得到確立。實際上，農民工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清楚知道怎樣來展示其作為公民的身分的。如同何妹子一樣，她們更多的是根據既有的法律條例來幫助自己辯護，但當這樣的努力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時，則需要更為深入具體的行動。在此，恐懼、行動、氣憤、再行動構成了一系列持續的連鎖反應，也一步一步地使得農民工作為公民的主體性慢慢成形。

基於公民應當「依法」的自我定位，在罷工抗爭之前，工人們很注重按照公民所應該遵守的程序以使得表達訴求的過程具有合法性。在NGO的指引和幫助下，工人們選出各部門思維比較活躍和有條理的人作為集體談判的代表，並委託廣東勞動維權事務所作為談判顧問，向廠方發出《深圳慶盛工人談判要約書》，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與廠方交涉。如同NGO成員老吳所觀察的，「這個集體談判，根據國家法律、廣東具體合同條例裡面的明文規定，集體談判可以談工資、談福利、談一切雙方可以談的問題，而且資方必須要回應。」

然而農民工的這種尊重體制內程序表達訴求的行動，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合法對待和解決，相反卻受到暴力的阻止和干擾。幾次合法訴求的表達所帶來的結果，都是廠方和政府出動保安和警察來對待工人，這也使得工人對於



官方所強調的體制內的合法程序產生懷疑。在老吳看來，這也激發了工人們尋找另外的途徑來解決問題：

工友們（覺得）給你的訴求和要約書你不回應，反而採取這樣極端的手段來打擊工友，這樣的情況下就不如停工算了，直接跟你（資方）談。這樣開始的幾天，是比較平和理性的，工友們也沒有出車間，也是按照作息時間，因為當時也是工廠搬遷，工友們想到如果搬遷，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就沒有談判的籌碼了……<sup>8</sup>

從這樣的過程可以看出，工人們對於自己公民身分認同的建構，在一開始是希望按照官方所規定的體制內程序來維權，但在過程中不斷地受到來自政府和資方的干擾和破壞（法規的模糊性，暴力對待合法訴求等），其結果體現在情感上便是工人們更加的不滿和憤怒。

不是說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法治社會嗎？但是最關鍵的一點，我說的我做的是不是言行一致？就包括現在說依法治國嘛，可是你看哪些方面反應了依法治國這點？警察隨便亂抓人，政府部門的信息不公開，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你說這些工人會服嗎？當我們是三歲的小孩……<sup>9</sup>

范君的憤慨意味著經過與霸權集團的周旋，通過官方所設定的遊戲規則是無法展示和爭取作為公民的權利的，其公民身分認同也如同「人民」一樣是有名無實的。從情感政治的角度來看，工人們所經歷的抗爭過程，也正是情感、主體和身分認同與權力集團相互較量及鬥爭的過程。從最開始的恐懼到後來不斷的失望和憤怒，工人們不斷地調整抗爭的策略，由開始的合法表達訴求、要求談判，到後來的罷工、占場、靜坐，再到之後的被遣返、鎮壓，可以說也是工人們希望重構自己主體性和身分認同的過程。作為次等的他者的恐懼，使得他們渴望成為被公平對待和有尊嚴的「人民」和「公民」，而這樣的渴望所遭遇的挫敗、失望和憤慨，又使得他們試圖擺脫霸權所設定的關於「人民」和「公民」的空洞內涵，並通過體制外的、表演性的、令霸權集團所恐懼的方式（罷工、請願、靜坐等）來重新改寫和定義其內涵，而這又引發了霸權集團更深的恐懼。

---

8 取自2015年8月1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9 取自2015年7月26日在慶盛工廠的實地採訪記錄。

## 七、結論

本文主要以深圳慶盛工人罷工事件為例，探討農民工作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之一，在遭遇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時所產生的恐懼。這樣的視角在既有的對於中國農民工的研究中並不多見。通過延續文化研究對於恐懼的政治性的討論，我們主要想探討的是恐懼作為既有權力結構和權力關係的產物，其政治性往往體現在社會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協調、矛盾和衝突當中。權力集團基於自身失去權力的恐懼如何發展出一套「自上而下」的治理策略，通過長期的政策性歧視以及與資本的共謀，造成了農民工對於沒有保障的未來生活的恐懼；而這些處於弱勢的、「自下而上」的恐懼又是如何轉化成為具體的政治行動，反過來強化了權力集團的恐懼。這些性質不同、方向各異的恐懼的政治性，共處在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性的架構中，相互糾結在一起，互為因果，彼此處在一種動態的相互作用過程中。

作為一種社會形構和文化實踐，恐懼的政治性往往是通過對於身體的控制和反控制來呈現的。恐懼往往是附著在身體上，通過身體呈現出來，並在不同的身體間流動、滲透、重組。「自上而下」的恐懼，往往是通過對於農民和農民工的身體區隔、限定、規範其身體所出現的社會空間並實行嚴密的管控，以確保統治的安全性；而對於農民工而言，其恐懼轉化為行動也往往是將身體作為一個場域，通過使身體變得被看見（占領工廠、阻止搬走機器、在公共空間裡上訪、靜坐等）來試圖打開新的政治空間。這樣的努力儘管最終並沒有達到最初的目標，但至少能讓他們的恐懼通過這些行動被更多的人聽到和看到，為未來一切可能的政治抗爭提供經驗。

此外，本文也討論了恐懼的政治性是如何體現在情感與主體認同的相互作用當中的。主體所展示的情感以及如何定位這些情感，與其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密切相關。作為一個弱勢群體，農民工們對於未來的恐懼往往會扣連到他們在權力結構中所處的弱勢位置，以及權力集團所設定給他們的「次等的他者」的主體位置。恐懼使得他們採取行動，成為更有尊嚴和能夠被公平對待的「人民」和「公民」。然而在爭取這樣的主體身分中所經歷的極度失望和憤慨，又使得他們試圖去填塞、改寫和重構作為「人民」和「公民」的內涵。可以說情感與尋找自身的主體位置，一直緊緊地與農民工們爭取合法權益相伴在一起，是其抗爭的政治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慶盛工人的例子顯示恐

懼的政治性是與身體、認同緊密扣連在一起的，並處在與權力集團不斷周旋抗爭的動態關係中。慶盛工人罷工已經結束了，但他們的恐懼並沒有結束。

需要提及的是，在當下官方以「維穩」為重中之重的語境下，慶盛工人所遭遇的情形也可能發生在其他弱勢群體身上，如城市裡的下崗工人、被迫強拆的居民等等。儘管不同的弱勢群體所身處的社會語境可能有所差異，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是他們所經歷的恐懼卻可能有著相似之處，這也意味著慶盛工人所經歷的恐懼的政治性尤其有代表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希望本文所討論的情感政治，能夠在中國的語境下獲得進一步的關注。長期以來，情感的研究往往被排斥在社會運動的研究視野之外，運動參與者的身分建構往往被看成是單純的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而忽視了情感在權力結構、主體生產、社會運動的文化形構等方面極為重要的扣連和接合的作用。任何情感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參與到特定的歷史節點上的權力關係的運作中，不管個體或群體以怎樣的身分介入，圍繞著情感實踐所形成的策略都體現了維護或抵抗既有的權力關係、排斥或培力新的可能性的角力與鬥爭，而這正是情感的政治性所在。本文所提及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不同的恐懼的政治性，正是代表了中國語境下的同樣的情感與不同主體位置相扣連所生產出的不同後果，即不同形構、動員、擴散和展示權力的路徑。這樣的政治性可能因為具體的語境與構成要素的差異——如不同的主體、權力結構的變化、不同的情感展示方式等——而呈現出不同的政治干預策略。這些不同的情感政治性接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詮釋當下中國社會政治的複雜性，從而避免簡約而僵化的分析套路，因此也值得更為深入地探討下去。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毛澤東。1991a。〈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3。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b。〈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71。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強。2012。《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第二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汪暉。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
- 汪建華、鄭廣懷、孟泉、沈原。2015。〈在制度化與激進化之間：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組織化趨勢〉，《二十一世紀》第一百五十期，頁4-18。
- 國家統計局。2015。〈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2016/01/10瀏覽）
- 許向東。2009。〈一個特殊群體的媒介投影——傳媒再現中的「農民工」形象研究〉，《國際新聞界》第十期，頁42-45。
- 張玉林。2012。《流動與瓦解：中國農村的演變及其動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辜勝阻。1991。〈中國兩類人口遷移比較研究〉，《中國人口科學》第四期，頁75-84。
- 楊繼繩。2013。《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南昌：江西高校。
- 寧應斌、何春蕤。2012。《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臺北：唐山。
- 劉世鼎、史唯。2016。〈拒絕用完即丟：優衣庫代工廠工人的身體抗爭〉，《人間思想》第十三期，頁176-193。
- 劉小平。2008。〈都市類媒體的農民形象建構〉。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113772/8423342.html。（2016/03/09瀏覽）
- 潘毅。2007。《中國女工》。香港：明報。
- 潘毅、盧暉臨、張慧鵬。2010。《大地之歌：中國農民工之歌》。香港：商務印書館。

## 二、外文書目

- Ahmed, Sara.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Altheide, David. 2006. *Terrorism and Politics of Fear*.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 Bauman, Zygmunt. 2006. *Liquid Fear*. Cambridge: Polity.
- Barbalet, Jack. 1998.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balet, Jack and Nicolas Demertzis. 2013. "Collective Fear and Social Change." in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ual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edited by Nicolas Demertzis, pp. 167-18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iddulph, Sarah. 2015. *The Stability Imperative: Human Rights and Law in China*. Vancouver: UBS Press.

Buechler, Steven. 2000. *Social Movements in Advanced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tivism*. New York: Oxford Press.

Chang, Leslie. 2009.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 Grau.

Cheng, Tei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in *China Quarterly* 139: 644-668.

Clarke, Simon, Paul Hoggett, and Simon Thompson. 2006. *Moving Forward in the Study of Emotions: Some Conclus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Demertzis, Nicolas. ed. 2013.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ual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an, Cindy. 2002. "The Elite, the Natives, and the Outsiders: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1): 103-124.

Flam, Harry. 1993. "Fear, Loyalty and Greedy Organizations," in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Fineman, pp. 543-575. London: Sage.

Fischer, William F. 1970. *Theories of Anxie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odman, David. S.G. 2014.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Polity.

Goodwin, Jeff,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ossberg, Lawrence. 1988. "Postmodernity and Affect – All Dressed Up with No Place to Go," in *Communication* 10(3-4): 271-293.

Harding, Jennifer. 2009. "Emotional Subjects: Language and Power in Refugee Narratives," in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Jennifer Harding and E.D. Pribram, pp. 267-279.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Jennifer and E. Deidre Pribram. 2004. "Losing Our Cool: Following Williams and Grossberg on Emotions," in *Cultural Studies* 18(6): 863-883.

———. 2010.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ggett, Paul. 2009. *Politics, Identity and Emotion*. Boulder: Paradigm.
- Hsing, You-tien and Ching Kwan Lee. ed. 2010.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New York: Routledge.
- Huang, Philip C.C. 1995.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21(1): 105-143.
- Jacka, Tamara. 1997. *Women's Worker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ka, Tamara, Andrew Kipnis and Sally Sargeson. 2013. *Contemporary China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Hank, and Bert Klandermans. 1995.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ing, Debra Suzanne. 2006. "Activists and Emotional Reflexivity: Toward Touraine's Subject as Social Movement," in *Sociology* 40(5):873-891.
- Kinnvall, Catarina. 2013. "Trau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Europe at the Crossroads," in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edited by Nicolas Demertzis, pp. 143-16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Lee, Ching Kwan. ed. 2007. *Working in China: 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 2010. "Workers and Quest for Citizenship,"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edited by You-tien Hsing and C.K. Lee. New York: Routledge.
- Lin, Xiaodong. 2013. *Gender, Modernity and 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Becoming a Modern Man*. New York: Routledge.
- Liu, Yu. 2010.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in *Modern China* 36(3): 329-362.
- Lyon, Margot L. 1998.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cus, George. 2013. "The 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ual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edited by Nicolas Demertzis, pp.17-3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airiti
- Massumi, Brian. ed. 199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ai, Hsiao-Huang. 2012. *Scattered Sands*. New York: Verso.
- Perry, E. 2002.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Mobilization* 7(2): 111-128.
- Rachman, Stanley. 1998. *Anxiety*. Hove: Psychology Press.
- Razack, Sherene. 2009. "Afterword: Race, Desire, and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scourses," in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8(2): 815-820.
- . 2012. "Memorializing Colonial Power: The Death of Frank Paul," in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7(4): 908-932.
- Reed, T.V. 2005. *The Art of Protest: Culture and Activism from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o the Streets of Seattl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bin, Corey. 2004.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lhoub-Kevorkian, Nadera. 2015. *Security, Theology, Surveill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linger, Dorothy. 1995.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Chances for Assimilation?"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D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pp.113-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un, Wanning. 2009.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pson, Edward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guin Books.
- Tong, Yanqi. 2011.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Past to the Present," 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2): 141-159.
- Troost, Dunya, Jacqueline Stekelenburg and B Klandermans. 2013, "Emotions of Protest," in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ual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edited by Nicolas Demertzis, pp.186-20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and Windus.

Zhang, Li. 2001.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